

懵懂中,我永远失去了父亲

倾诉人、执笔人:张道康
男 56岁 工程师

父亲去世已近五十年了,他的骨灰安葬在苏北老家。最近,我率妻携子回到父亲的墓地寻觅,掬一把父亲坟前的土,献上我半个世纪的思念和愧疚,那四周郁郁葱葱的青松陪伴着父亲。我想,父亲您是不会寂寞的。

我上课的时候,父亲去世了

一九六〇年六月九日下午,我正在户部街小学上一年级,突然邻居小孩魏金宝在窗外叫我,说我家出事了。我急忙跑回家,家门前停着一辆白色的救护车,父亲静静地躺在床上,双眼紧闭,脸色煞白,穿白大褂的人紧张地忙碌着。不一会儿,一个戴眼镜的人把手一挥:“没希望了,准备准备吧。”一会儿又开来一辆墨绿色的三轮摩托,父亲被放在担架上抬出了屋子,母亲呼天抢地地扑了上去,像是要抓牢父亲不让他离去。

周围是一片惋叹声,我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,只是感到很害怕,胆怯地蜷缩在桌子的角落,我竟然没有哭,也不懂母亲为什么那么悲伤,父亲为什么不说话呢?我一点也不知道,从此我就永远失去了父亲。

阴错阳差,父亲和部队失去联系

据叔叔讲,爷爷祖籍原在安徽一风景秀美的山区,家中还有一座祠堂,名为“百忍堂”。由于战乱,爷爷迁移到苏北宝应地区,在一家作坊里帮人管账,收入菲薄。我大伯智障,排行老二的父亲七岁就被送到杂货店当学徒。那时学徒就是被当佣人使唤,除了店里的活,在家还要替老板娘烧茶、倒水、擦地、倒痰盂。稍大一些,老板就带着我父亲出门进货了。



后来爷爷生病失去了工作,家中越发困难,父亲挤出时间,向爷爷学了基本的会计常识,自己又经常琢磨,每天忙到深更半夜,二十多岁时,他已经是一个很不错的会计了。

当时有一位姓孙的亲戚在八路军阜宁县政府任职,他介绍父亲到县政府后勤部一油坊上班,孙爹爹是总经理,父亲是总会计,他勤勤恳恳地工作,把油坊的生意搞得红红火火,经常受到上级的表扬。

天有不测风云,有一年爷爷去世了,按老家的风俗,大伯智障不能张罗,只有我父亲出面料理。父亲本不想回去,可奶奶一个妇道人家几次带信,父亲是个孝子,他只好向组织请假回宝应料理爷爷的后事。就在父亲尽孝期间,部队突然接到命令转移了,不久就听到了大军渡江的消息,孙爹爹他们雄赳赳地来到了南京,而父亲却留在了老家。

后来,已在南京古生物研究所任领导的孙爹爹,写信邀请父亲到南京,父亲带着奶奶、二个叔叔和我们母子共九

口人到了南京生活。

父亲鼓励我提早上学读书

来南京后,父亲考虑要有技能才能生存,他先后培养二个叔叔分别考上外贸、财会学校,后来叔叔们都找到不错的工作。父亲让母亲进了缝纫学校,自己又专门读了财会专科,有一次我看见贴有父亲照片的毕业证书上的“政治经济学、数学、国文”等课目的成绩都是90分以上。母亲后来来到缝纫社上班,父亲在中央商场找到了工作。

每天晚上,父亲都在桌子前看书、算账,我有时会凑上前去,他抱起我坐在他腿上,教我拨算盘、背口诀。我五岁那年,哥哥姐姐都上学了,我也很想去,就天跑到学校,骑在门口的石墩子上等哥哥姐姐放学,父亲见过几次。他和母亲商量让我早读,并自告奋勇地带我到学校应考。

我顺利地写出父母和自己的名字,算术题也不是问题,老师最后拿出一大一小两只墨水瓶,小瓶内有大半瓶墨

水,我稍加思考就说小瓶重,老师满意地在成绩单上打了五个钩。

等在外面的父亲闻讯,高兴地抱起我,在我脸上用力亲了一下,那坚硬的胡须扎得我好痛,可我的心里却十分快乐。

病中的父亲分了一块鸡翅给我

父亲很忙,经常天一亮出门,很晚才回家,我们有时几天都见不到他,可到了难得的休息日,父亲会用老式的铜盆盛上满满一盆热水,替我们哥姐四个一一洗头、洗脖子。

三哥长身体了,他总也吃不饱,一次他见到大铁锅里还有一些锅巴,使悄悄溜进厨房拿了一块,奶奶赶来一巴掌,说这是你爸的晚饭,逼着三哥把锅巴放回去。父亲回来听说后,就搂了搂三哥,并把自己的锅巴烫饭给三哥吃。

一次,我班最顽皮的姚同学从背后摔我一跤,小腿骨裂有十多厘米,父亲背我上医院打了石膏,并嘱咐不能上学的工作。父亲在家自学,不懂就问他。后来我稍稍好些,他就每天背我上下学,他那瘦削的肩膀担着我的身体,那感觉至今清晰地存在。

一年级下半年,我光荣地入了队,当我戴着鲜艳的红领巾回家向父母报告时,当时已生病的父亲吩咐母亲,从亲戚送来的鸡汤中盛了一小碗汤,还夹了一块鸡翅奖励我,我自小到大,从未吃过如此鲜美的鸡汤。

善良的父亲乐于助人

父亲很忙,但他很热心,我们住的院子是一套木结构的老楼,堂屋的门高近四米,上面全是一格一格的窗,大多数玻璃均已损坏,每到临近天冷,父亲都从外面捡回一些牛皮纸,用点面粉打成稀糊糊,在桌上架二层方凳,独自爬上爬下,忙乎一整天,吃力地把每一个窗口都用纸糊好,使全院人免受风寒之苦。

看到院子孩子多,没什么

玩具,他偶尔会买点次品的板球拍、跳绳等让大家玩,我有时小心眼想独自玩,父亲告诫我,大家玩玩也玩不坏的,小朋友要团结友爱嘛。

有一次,父亲下班经过中华剧场时,看到两个三轮车工人在打架,其中一人头被打得鲜血直流。父亲拨开围观的人群上去询问,原来是其中一人借二丈四尺布票无力偿还。父亲竭力劝阻他们,并承诺相帮,他急匆匆跑回家取了家中所有的布票送给那名素不相识的工人,平息了他们的纠纷。事后母亲埋怨他说:“俺几个小孩不要穿啦?”父亲憨厚地搓搓手说:“我就是看他们蛮可怜的。”

父亲的坟消失在书声琅琅的校园里

父亲的骨灰安葬在苏北老家的一无名小山边,只是用土堆了一个小小的土包,既无水泥砌筑的墓室,又无碑刻的墓志铭,仅有一块薄薄的青石板,孤零零地立在极不起眼的坟前。

一九七〇年我刚工作时回去过一次,当时还健在的外婆领着我去父亲的坟上祭扫。由于岁月的侵蚀,坟上长满了杂草,坟头也变得低平,我在坟前栽了一棵小松树。

一晃又四十年了,最近,我率妻携子,来到父亲的坟前寻觅。

这里早就成了一所小学,一座乳白色的教学楼迎面耸立,楼前排列着整整齐齐的绿草,宽阔的操场上,五星红旗高高地飘着。老门卫告诉我们,这里确实是一片坟地,后来平坟建校了,至于那些树嘛,大多数是后栽的,也有原来种的。

我们带着孩子来到最粗的那棵松树前,恭恭敬敬地鞠了三个躬,每人在树下掬起一把家乡的土,那土黄黄的,粘粘的,微凉而湿润,散发着一股淡淡的松树气息。

我想:父亲,有那么多挺拔苍翠的青松陪您,有那么多天真活泼孩子的书声、歌声伴您,您是不会寂寞的。

忆故人

逃兵外公

我小的时候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外公家度过的,在我记忆里,外婆很疼我,处处护着我。外公很凶:每次我撒娇不吃饭的时候外婆就会不厌其烦哄我吃饭,这个时候外公就会冲着我嚷。

外公很喜欢看电视,他每次都会在侧面的矮椅上弓着身子坐着,手里捧着用吃完的玻璃罐头瓶装的热茶水,在一旁的茶几上放着一盘盐炒花生。外公就这么边看边吃,外公的牙没有几颗了,所以他吃花生的模样让人看着有些滑稽。

外公特别喜欢看战争片,尤其是解放战争的题材。我在一旁时还经常跟我讲新四军的故事。还说哪个哪个将军是他战友,这个谁那个谁也是他旧识。稍大一些的时候我就问妈妈,妈妈笑着跟我说:“你外公原来是新四军游击队的,不过经常开小差逃回家,解放战争时给解放军抬担架,后来外公逃了回家,路上又遇上了解放军的盘查,外公‘机智’地说自己是被蒋军拉去抬担架逃回来的。解放军于是又给吃的又送路费的放走了外公。外公就这么顺着铁轨一路跑回了家。”

后来我“责问”外公为什么要开小差,外公很严肃地说:“有很多抬担架的后来是做了官,但是更多的是死在了战场上,我还有家,我不能死!”的确,当时外公已经有了家室,那是外公的第一个女人,而且她当时挺着大肚子。他不顾一切回来只是想过普通人的生活。

外公和外婆都是再婚,外公和第一个女人有一个儿子;外婆也是带着两个女儿和外公结婚的,妈妈是他们唯一共同的女儿,所以那时候妈妈在家里最被疼爱。妈妈嫁到江苏后,外公一直放心不下,于是经常带着东西过来看望妈妈。虽然是坐车过来,但从外公家到车站要走10多里土路,外公每次就这么用一只扁担挑着鱼、鸭、鸡蛋送到我家。

记得那时候妈妈是个个体户,做工艺活需要竹子,外公就经常砍些屋后竹园的竹子捆成两捆用扁担挑着送来。有一次外公挑着竹子过独木桥的时候不慎摔到了河里,河虽不深,但是时值隆冬,刺骨的河水打湿了外公单薄的衣服,外公是个直性子的人,他认为土路走了一半再回去换衣服有些耽搁时间,于是索性就这么爬起来挑着竹子继续朝车站走去。到我家的时候,他已经啰嗦得不能说话了,在床上躺了足足两天。

长大后外公就少去外公家了,去年夏天再见到外公的时候他身子骨就不行了。被妈妈接到我家就医时,医生说外公的五脏六腑都有毛病,根本活不过一个月。但是我的外公却艰难地挺过了3个月。

当时是8月最热的时候,每晚最困难的就是给外公淋浴。我和妈妈一个人扶着外公,一个人拿着蓬头,外公已只剩皮包骨,大口大口地呼气吸气。我给这个头发花白的外公洗头的时候就像给新生儿洗澡一样小心,生怕弄疼了他,因为外公连喊疼的力气都没有了,妈妈只是在哭,像个无助的小孩。

外公最终还是没能挺过第四个月,这个坚强的老头走完他人生平凡的84年。他没有成为什么英雄,他始终是个普通的农民,是别人的丈夫,别人的爸爸,别人的外公。

(请作者告知地址,以便邮寄稿费)

照顾了三个卧床病人,我心甘情愿

倾诉人:王亮 40岁 蓝旗街

曾经沧海难为水,这句话对我非常确切。在我20多岁的时候,正当人生的好时光,就遭遇了家里三位长辈先后病倒在床的事情。作为家里面唯一的儿子,我代替唯一未病倒却同样孱弱的母亲,承担起了照顾病人的重担。如今,三位长辈都已经去了,回首往事,我觉得只有愧疚,没有抱怨。

刚工作,父亲就脑血栓病倒了

我家住蓝旗街,家庭有点特殊,母亲是作为长女留在外公外婆家的,父亲相当于是人赘的女婿,而我又跟了父姓。

我自小就是在父母和外公外婆的关怀下长大,外公外婆都是退休工人,父亲是镇江人,后来在南京中央门一家化工厂上班。

虽然家庭不富裕,但是起初的生活还过得去。拆迁前我们家住在城北,还开了一个小店,我有时候看看店,那时候看到小孩子来买东西,我从不计较,经常多给,我妈说那时候就看出我本性善良。

高中毕业后,我进入了一家建筑公司上班,但是上班后没几年,才50出头的父亲突然病倒,而且是脑血栓。这个家一下子失去了顶梁柱,父亲的病很重,治疗收效甚微,只能终日躺在床上,工作干不成

了,收入也随之下降。

父亲病倒了,两个老人身体都不好,这一切都得由我来承担,而最令人揪心的是,偏偏我母亲身体也不好,有高血压等。我有个姐姐,但姐姐毕竟要嫁人,真正能出力的就只有我了。

为照顾父亲,睡觉手里都攥着尿壶

父亲病倒以后,我的工作就受到牵连,经常迟到,为此还受到了领导的批评。那时候父亲躺在床上神志不清,大小便都需要人来搞,有时候早晨我正要上班,父亲要大便,我就必须留下来搞干净再走。这样一来,一周总有两三天是比别人晚到的。

我这人好个面子,遇到这种事情我也从来不愿意讲,直到最后单位改革我被裁下来,领导才知道了我家的情况。领导还问我,我笑笑就算了。后来,爸爸晚间要翻身以防止



褥疮,母亲有关节炎,没力气翻动。后来几年,就干脆由我陪爸爸睡了,父亲的床铺潮气大,为了照顾父亲小便,我随时把尿壶攥在手里,就那样囫圇睡。

母亲说过,自从那几年跟父亲睡下来,我的体质就不行了,经常感冒。还说老人都讲,小伙子的阳气给病人拔掉了!

可是屋漏偏逢连夜雨,在父亲病倒的次年,我外婆也病倒了。外公性格倔强,坚持自己夜间照顾老伴,结果夜里面摔了跤。后来又患上了老年痴呆,短短几年内,一个家庭就有了三位卧床病人!

照顾三个卧床病人10多年

那时候我还年轻,为了

这个伤兵满营的家庭,我只有一个人当作两三个人用。恰好外公外婆和自己家住在对门,我就经常来回“串门”。

家里当时也给两个老人请了保姆,但是保姆一个人也忙不过来。到了夏天,我就每天都把身体较胖的外婆背到自己家里,然后帮外婆洗好澡再送过去。夜里面,只要老人有什么事情,我也得赶紧爬起来,冲到对门去,或者是帮着服药,或者是直接送医院。

我们家的保姆不好找,工作量太大,人家都不愿意。起初是找了一个保姆,后来保姆看不行,把自己丈夫也叫来,夫妇俩一起照顾。其间保姆几次提出要走,每次我们家最后都只好加工资,勉强留住人。

长期照顾病人,说句大实话,自己也成了照料的行家。可以说,一般人根本没有我懂得照顾病人,像父亲,起初还有点意识,后来就基本糊涂了,可是父亲一个动作,我就明白父亲要什么。

父亲卧床达14年,一般人可能早就是褥疮烂到骨头里了,可是我摸索出用艾条熏烤的办法,每天坚持两三个小时,直到临终,父亲褥疮都很轻微。

女友到家里看了一眼,掉头就走

2002年,外公去世了,2004年,父亲去世了,2005年,外婆去世。3年之内,我们家经历了重复的伤痛。特殊的家境,使我们家几乎没有积蓄,而我的婚事也一拖再拖。

以前也谈过一个南京的女孩,人家到家里一看,掉头就走了。直到30多岁,我才娶了一个农村户口的姑娘,说起这件事,我母亲总是感叹,说是这个家庭拖累了我。可是我并不这么想,我再苦再累,还能比得上病人吗?他们都那么老实本分,不该受这种罪啊!我所能做的只是尽自己的最大能力,帮助长辈减轻痛苦,这是最基本的了。或许现在的年轻人不易做到,但我自己一定会的,而且我觉得做得还不够。

目前我的生活很平静,母亲身体不好,由于风湿,已经基本丧失了活动能力,很多家务事都是妻子和我自己在做,女儿也上小学了,我现在的愿望就是家庭和睦,母亲长命百岁。为此,无论多忙,每个周末都要用轮椅把母亲推到新街口或者月牙湖去玩,让老人散散心,她心情好了,对身体自然就有好处。

快报记者 孙玉春

征集“南京人的情感故事”

如果你有难以忘怀的情感经历,无论是亲情、友情还是爱情,我们都将聆听你的倾诉。可以投稿也可提供线索。热线:025-84783552(周一至周五下午两点以后) 信箱:kbmjns@126.com; 论坛:www.js.cn·论坛·都市杂谈·都市情感